

【工会史】

中共早期培养工人阶级意识的探索

熊秋良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结合中国工人的现状,集中从教育、宣传和组织三个层面培养其阶级意识: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使工人在共同学习的空间接受新的话语,产生阶级情感的共鸣,认同阶级身份;创办工人报刊,发行特号、特刊,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报道典型罢工事件,使工人认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产生共同信仰,提出共同诉求;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消除帮口、行会固有的角色与身份差异的分歧,使工人阶级走向统一。中共遵照马列主义理论,立足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使一盘散沙的无产者成长为无产阶级,既体现党的理论自觉,更反映了党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无产者;阶级意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报刊;全国劳动大会

【作者简介】熊秋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21.5.89~102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百年发展史研究(1921-2021)”(20&ZD017)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无产阶级的形成离不开阶级意识的培养。以往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大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将工运史嵌入党史之中,按照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逐渐由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叙事规范,来诠释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就是这种解释框架的代表作。自“新劳工史”研究兴起后,一些学者更关注工人的生活经历、地缘、血缘、文化习惯等因素对阶级意识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强调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主体性,并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考察早期工运史。不可否认,“新劳工史”研究拓宽了工运史的学术视野,丰富了工运史的内涵,不过其成果大多为区域性或个案研究,乃至有学者认为:“新劳工史学者在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影响下反而可能过分沉溺于日常与琐碎的微小叙事中,而消解了更加宏大的结构和历史。”^①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回归到主流工运史的解释框架,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共早期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培养。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社会是在工人阶级意识成熟的基础上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然后以此指

导工人运动,但中国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径。中共成立后,接受马列主义的主张,努力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担负起解放自身的重任。1926年1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通过的《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明确说道:“中国职工运动自发生以来,即完全在中国共产党指挥之下,故中国职工运动完全由中国共产党所手创所组织的。”^②考察中共早期工运史的实践,可以发现中共在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培养时,并没有忽视无产者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经济、政治利益诉求。中共召开的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案,认识到工人教育水平的落后,行会、帮口和黄色工会以及不同产业类别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工人运动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具体的措施。因此,本文不拘泥于个案考察,仍从总体性上探讨中共早期在教育、宣传和组织三个方面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培养,同时考察中共在教育上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名词、核心概念入手,在宣传和组织上将较松散、异质性的无产者群体培养为认同阶级身份、具有阶级意识和争取阶级利益的无产

阶级,以此说明中共的政党自觉以及在早期进行的艰难探索。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的……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③虽然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但从中国革命的载体、前途和领导阶级力量等方面考察,应充分肯定中共将工人培养为无产阶级的深远历史意义。

一、“我是工人”:共同的学习空间与阶级身份认同

无论是政治启蒙还是阶级意识的培养,没有教育的推行就像空中楼阁。因为产业落后、生计困难,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普遍不高。时人曾指出,中国工人过着如牛马奴隶般的生活,为什么自身不觉得被压制呢?原因有二:一是受环境的压迫,二是知识水平低。归结起来“一是不觉悟,一是不了解”^④。对于中共来说,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既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政党壮大的必然要求。中共成立时即提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启发阶级觉悟,培养工人骨干,并将其打造为工人活动的基地,在此基础上创建产业工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同时“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⑤。中共四大进一步指出,针对工人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状况,可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智识”^⑥。共产国际也鉴于中国工人队伍的阶级认识较为幼稚,提出“须以有组织的力量及明确的思想补偿之”^⑦。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党

团员和进步学生深入工厂,在产业工人聚集的城市创办了各类工人补习学校(见表1)。

各地党组织在领导各地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大多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或类似的工余学校,如受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的影响,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杨树浦、吴淞等地开办了多所工人夜校;在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的带动下,30多所平民学校陆续在天津兴办;在绍兴印刷工人业余学校的推动下,该地兴办了七八所平民学校;在武汉,林育南、许白昊等在武昌第一纱厂、汉阳钢铁厂、南洋烟厂陆续创办了工人识字班,武汉中学则在校外举办了一个无固定场所的劳工学校,哪里有工人就在哪里挂起黑板进行授课。工人补习学校提供的共同学习空间具有场域性、即时性和扩张性的特点,原本互不相识的工人借此聚集在一起,人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后,报名的工人曾达200多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利用国民党创办的基础,在杨树浦开办的工人夜校有工人六七十人;在吴淞开办的工人夜校,工人达四五十人,其中以中华铁工厂工人人居多。^⑧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成立时,第一期招收的铁路、纱厂工人和学徒有40余人,而与工余学校产生联系的工人达数百人之多,成为工人学习和阅读的重要场所,被上海《民国日报》誉为“天津劳工运动的一道曙光”^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从1922年第一所学校设立到1925年止,各类学生达2300人^⑩。人数的集中无疑有利于阶级启蒙,加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党团员在工人补习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时,首先让无产者破除根深蒂固的“苦力”“下等人”等传统观念,使其认同“工人”身份。为此,党团员教他们认识

表1 中共建党前后创办的工人补习学校

学校名称	主要创办人	创办时间	学校名称	主要创办人	创办时间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邓中夏、张太雷等	1921年1月	安源工人补习学校	李立三等	1922年1月
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	陈独秀、谭平山等	1921年7月	唐山铁路工人补习夜校	邓培等	1922年7月
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	李启汉等	1921年8月	杭州铁路闸口机厂工人自修学校	沈干城等	1922年10月
天津工余补习学校	于树德、安体诚等	1921年9月	绍兴印刷工人业余学校	王承纬、何步云等	1924年2月
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	包惠僧、陈潭秋、施洋等	1921年秋	济南工人补习学校	济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	1924年8月

“工人”二字,对“工人”所表达的阶级内涵进行全新的解释,努力树立他们顶天立地的形象,增强信心,结合他们共有的经历,帮助其完成阶级身份的认知和转变,并赋予其阶级使命——“做天下的主人”。

李大钊到郑州铁路工人夜校视察时,就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工人的苦难生活,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劳动果实,鼓励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鼓动说:“工人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天字,我们工人阶级要顶天立地。”^①传统对“工”字的解释就是做工的人别想出头,工字一出头,就入土了。但李大钊赋予“工人”二字以新的内涵,工人们听后深受启发。“工人”二字所包含的阶级意义也广为流传。如邓中夏对长辛店铁路工人演讲时说道,工人是顶天立地的伟人,“工”“人”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天”字^②。他到沪西工人俱乐部上课时,先教工人认识“工”字,然后解释其意义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这就是工人的形象。刘华在邓中夏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说,工人将来要做天下的主人,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工人的力量大如天^③。郭亮在给岳州铁路工人上课、启发工人的觉悟时,同样先教“工人”两个字,然后通俗地讲道:“有人说工人生成命苦,‘工’字出不了头,工字出头就是‘土’——工人只有死路一条。我看不对,你们看‘工’字中间一竖,上顶天,下立地,工人是社会的台柱子,‘工’字和‘人’字加在一起就是‘天’字,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大于天的力量。”^④郭亮通过对“工人”二字进行对比解释,否定了工人“命苦”的消极认识,向工人表达了他们是社会“台柱子”的积极身份信息。施洋、陈潭秋、林育南等人在给武汉工人讲课时,也先教工人认识“工人”二字,然后教“我是工人”“我是粤汉铁路工人”等字句,使他们找到身份的归属;同时联系工人的劳动实际,讲述“劳工神圣”的道理,告诉工人,他们才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人类的衣食父母”^⑤,从而启发工人认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吴淞平民日夜校的一位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写下一首《一天做工八点钟歌》:“人生在世须做工,只吃不做理不容”,“这个世界靠农工,工人每日工厂中。红热煤炉火星送,矿穴劳工头如蓬。建造世界做苦工,夏来春去苦无穷。做了一会请收工,世界公认八点钟”^⑥。歌词

鲜明地表达了工人觉悟后的政治诉求。

中共从阶级意识启蒙的角度重塑了工人的形象,肯定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残酷的现实是工人被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要培养无产者的阶级意识,还须进一步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使其理解受苦的根源,努力争取自身的解放。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概念,通俗地说,“剥削”就是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邓中夏在给沪西工人上课时,为了让工人们懂得“剥削”的意思,他先教大家念两遍,然后问工人,你们做一天工,有多少工钱?工人们有的说一角多,有的说两角。邓中夏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向工人们通俗地解释工钱与剥削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个工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活,纺十斤纱,照市面价格,十斤纱可以卖十块钱。除纺十斤纱花费的成本、机器折旧等六块钱外,剩下的四块钱,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工人只能拿到两角钱,剩下的三块八,全被老板装进腰包,这就叫‘剥削’。”^⑦邓中夏通过工人们的切身经历对“剥削”一词进行解释,既使他们懂得“剥削”的涵义,也使他们理解了正是剥削造成了贫困、压迫和奴役,造成了社会巨大的不公平和他们的苦难。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教材编写上费了许多心思。1924年至1925年9月,陈清河编写了四册《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补习教科书》,另外编辑了补习工人文化知识的《工人读本》。对于工人补习教科书的主旨,陈清河写道:“在促进劳动者阶级觉悟,造成健全的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工人读本》则直接传授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中写道:“资本家,占有工厂矿山和银行,他们又有海陆军和政府。他们是资产阶级,又叫做压迫阶级”,“我们贫苦的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两只手,两只脚,要把劳力卖给资本家,才不至于饿死,我们是无产阶级,又叫做被压迫阶级”,“马克思,他是共产主义的开山祖。要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又说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团结即是力量!’”^⑧在让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教师还指导他们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演讲,题目有“私有财产之流毒”

“阶级制度之罪恶”“工人怎样去夺取政权”等等^①。正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工人们逐渐产生了阶级意识的自觉。在“五五”马克思纪念节上,安源工人仲岚写道:“马克思的主义,差不多散布满全世界了,然而他的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的人民,唯一的指南针。”他指出,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设了劳农政府。中国工人们“赶快起来反抗我们的仇敌,因此,我们不能不努力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②据当时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学员回忆,“夜校名义上是教工人识字,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当时国民党关于安源路矿工人的报告从侧面也印证了中共培养工人阶级意识的成功,其报告称:“他们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并非很机械地去宣传共党主义……他们是首先注重工人的识字及增高其普通常识。每周对工人有政治报告、通俗讲演及化装讲演、工人辩论会、研究会等,共党主义即在这些机会中,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③

唐山工人图书馆的党团员在与矿工的联系中,巧妙地地从传授技术入手,组织工人读《大公报》《晚报》,讲解全国工运形势和革命道理,带领工人阅读党的书刊,把藏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向导》《新青年》《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先驱》等革命书刊秘密地借给会员阅读,并借此评论时事,讨论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政治问题,启迪工人的觉悟,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将工人团结起来。唐山工人图书馆也因而被誉为“工界的一颗夜光珠”^④。济南工友读书会成立后,党团员组织工人学习、研讨《共产党宣言》以及《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发表的有关文章,参加学习的工人经常有五六十人左右^⑤。陈潭秋、林育南等给武汉工人讲课时,有时也结合读报讲解时事,对那些刚识字的工人,分发编印《两个工人谈话》之类的小册子,作为文化学习和思想教育的教材。王承纬、何步云在绍兴成立印刷工人联合会后,聘请中共党员何赤华、何孟英等为教师,除给工人们补习文化知识外,还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如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剥削等^⑥。

列宁曾强调革命的政党要对无产者进行理论宣传,给他们讲课,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政党的

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⑦,使无产阶级走向自觉。中共早期的党团员积极投身工人教育活动,他们创办夜校,为工人们打造了一个共同学习的空间,提供了交往和交流的场所。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讨论时事,开展讲演。通过党团员的讲授,他们了解时政大局,知晓世界、国内各地的工人消息,思考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在共情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有机嵌入,使工人接受共同的阶级教育,增强阶级意识,更新个体的自我认知,逐渐完成向无产阶级的身份转变。

二、“工人的喉舌”:表达共同的阶级利益

中共除了创办工人补习学校、面向工人进行阶级启蒙外,还借助报刊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凝聚阶级意识。列宁指出:“工人报纸是工人的讲坛”,“报纸……是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手段”^⑧。中共特别注重报刊这一宣传和教育平台,尤其加入共产国际后,中共积极面向工人群众,领导相关机构创办了不同类型的工人报刊,对工人宣传革命的理论,培养阶级意识,鼓励其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这一时期主要的工人报刊,有的是由中共创办的,有的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刊的,有的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省总工会出版的(见表2)。

《工人周刊》创刊时明确表示,办刊的目的就是要描写工人的疾苦,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制定指导工人联合的方针及计划。因此,该刊大量报道国内外劳动消息,反映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状况,努力启发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指导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进行斗争,因而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共产党》月刊曾称赞《工人周刊》“办得很有精神”^⑨。《真报》也公开声明“以拥护劳苦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⑩,积极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大量报道各地的工人运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残暴、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深受工人群众的喜爱,被称为“劳动福音”、武汉工人的“喉舌”。《中国工人》报道了大量工人受压迫的惨状,面对山东博山矿工住在山洞里、衣不蔽体、常常发生死人事事故的惨

表2

中共早期创办的工人报刊

刊名	创刊时间	创办者	刊名	创刊时间	创办者
《工人周刊》	1921年7月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劳工周刊》	1921年10月	湖南劳工会
《中国工人》	1924年10月	中共中央	《真报》	1922年10月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工人生活》	1925年7月	中共天津地委	《上海总工会日刊》	1925年6月	上海总工会
《劳动周刊》	1921年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工人小报》	1926年1月	天津总工会
《山东劳动周刊》	1922年7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山东分部	《工人导报》	1926年11月	湖北全省总工会
《劳动周报》(武汉)	1922年底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武汉分部	《青年工人》	1923年10月	邓中夏

状,该报呼吁道:“全中国的工人伙计们呀!试看我们工人处在一种什么奴隶地位呀!……连牛马都不如了……没有人能援助我们,只有赶快大家齐心齐意地团结起来……扫除一切压迫掠夺的阶级!”^②《青年工人》各期均辟有“名辞浅说”栏目,通俗浅显地解释“阶级”“资本”“劳力”“剩余价值”等名词概念^③,向青年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人则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理论,解释工人们为何要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获得解放;指出资本家要得到最大的剩余价值,必须尽可能压迫工人获得大量的剩余劳动,使他们没有任何自由,就如同中世纪的农奴。因此,“工人的知识就是阶级觉悟,阶级觉悟是从阶级争斗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工人的教育方法也就是他们的阶级争斗”,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斗争中认清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即由此而认清了一切社会问题和一切科学的价值”。^④

除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工人报刊外,针对重大工人运动和重要的纪念活动,中共还发行了纪念特刊、特号和专号,向工人进行重点宣传。这不仅可以增强工人的阶级意识,而且更能集中传播马列主义的知识,取得更大的教育效果。

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共成立后组织的一次具有全国影响的工人罢工斗争,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团结战斗的象征。为了纪念这次罢工,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编辑出版了《二七二周年纪念册》。打开纪念册看到的是二七被难烈士施洋就义和入殓的遗像以及林祥谦、刘寿真、曾玉良、叶志松、邱在坤、陈伯年、晏佑来、陈端

炳、刘耀亭、邵承鹰等19人的遗照。纪念册刊载了《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工人》《“二七”万岁》《为“二七”死于忠义的工友二周年纪念放声一哭》《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二七”纪念与工人》《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等33篇纪念文章和诗歌,指出二七的历史表明,正是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新的觉悟,即使在高压之下也勇于战斗,并强调二七烈士的牺牲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是专为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困苦而牺牲性命的”^⑤。正是在罢工、示威、革命等反抗中,工人阶级认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并逐渐产生阶级认同,形成阶级意识。

1925年6月19日,为支援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6月2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创办了《工人之路》,从1925年7月1日起出版“特号”,每日四版,一直持续到1926年11月。该报“特号”每期都有对省港罢工进展的详细报道,如《省港罢工工人对国民政府的要求》《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文告,《我们与我们的敌人》《被压迫的民族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南京学生捐款救济工人》《陆丰农友捐款一千元助工》报道了各地对省港罢工的支持。这些文章通俗易懂,战斗性强,深受工人欢迎,日发行量达1万份以上。为了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12月11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第102期整版刊载了“反段市民大会专号”^⑥,报道上海市民反对军阀段祺瑞大会的情况。上海总工会借此发表时局宣言,号召革命的工农商学以及民众共同起来铲除军阀统治,团结反帝。为了纪念五卅运动,1926年5月,上海总工会主

办的《工人画报》第15期出版“五卅纪念特刊”，揭露并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⑨。

为了鼓舞工人的阶级斗争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和接受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提高阶级觉悟，一些工人报刊借助对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发行专号和开设专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逝世一直为中国革命民众所纪念。1924年3月15日，《青年工人》第3期发行“列宁特号”，发表了五篇悼念列宁的文章，其中有邓中夏的《列宁传》《我们为什么追悼列宁》、世崎的《列宁与青年工人》《列宁主义与中国》。1926年2月，《上海总工会三日刊》第109期开设“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专栏，歌颂列宁一生的丰功伟绩，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并指出中国工人要翻身解放，就“应该遵从列宁的教训，联络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共同推翻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而握得政权的时候，才是工人完全解放的时候！”^⑩作为特号的《工人之路》在1926年1月21日也发行了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特刊，刊登了《列宁传略》《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的俄国共产党》《列宁逝世后二周年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等文章。对列宁的广泛纪念，使工人们深受影响，据报道，上海的一些工人“在工厂的墙壁上，大书纪念列宁等标语，使日资本家惊惧，严查写此标语之人，并向工人们作反对列宁的宣传”^⑪。

黄爱、庞人铨是中国现代工人运动中最早牺牲的烈士，大多数工人报刊开设专栏追悼和纪念他们。1922年2月17日，《劳工周刊》出版“黄爱、庞人铨特刊号”，详细叙述了两位烈士创立湖南劳工会的经历和牺牲的经过，刊发了劳工会旅沪会员给湖南工人、全国工人的函电，号召工人们起来斗争，反对军阀强权。3月26日，该刊又发行“上海追悼黄、庞纪念号”，在宣言中呼吁道：“资本家和军阀杀我们底人，封我们底会，我们是不甘屈服的……总有一天要使他们降服在我们的面前。”^⑫《工人周刊》从第28期至第31期开设专栏悼念黄爱、庞人铨，如第29期转载《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你们且瞧着吧》等文章，第31期发表南京工人太瑞的《论黄庞二烈士死的价值和荣誉》、汉阳工人其亲的《哪里杀得完》等。这些文章借助对黄、庞的纪念，向工人群众宣传劳工

组织对于工人团结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鼓励他们继续斗争。

五一纪念活动是工人报刊报道的重点内容，常常会发行专号。如1922年五一节期间，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以纪念黄爱、庞人铨两位烈士的形式发行专刊《血钟》，号召“以劳工专政为改造社会底唯一步骤”^⑬。1923年，《工人周刊》出版“五一特刊号”，发表高君宇《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文虎《年年五月一日》、树彝《五一节和中国劳动运动》等文章。《中国工人》1925年第5期发行“五一特刊”，发表了张特立《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时威《五一节的回忆》、秋白《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等七篇文章。1926年5月1日，《工人之路》也发行“五一节纪念特刊”，发表邓中夏《今年五一的目标》一文，提出“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是当年五一纪念的重大目标。裕业的《今年的五一节》强调工会组织必须更加严密和健全起来，努力提高工人政治斗争的精神，要求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这样才能使工会成为战斗的机关。《“五一”劳动节告工友们》认为纪念五一节不只是争“八小时工作制”，更要“将资产阶级铲除，实现劳工专政”^⑭。《“五一”劳动歌》唱道：“五一运动，五一运动，劳动者向压迫阶级进攻！”^⑮

早期的工人报刊和特号、特刊设置的栏目形式多样，有评论、时评、劳动要讯、劳工消息、世界要闻、随感录和劳动文艺等，所刊文章大多内容浅显、语言通俗，契合工人的认识水平。如1925年7月3日《工人之路》特号的时评《为甚么罢工？》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者枪杀的是“我们同阶级的工人及对工人表同情的学生与市民”，因此要起而奋争。这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暴行径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认识到个体属于一个阶级的共同体。正如工人们所说：“现在有些人说我们工人没有知识不能合作以对外，这实在太笑话！原来我们工人的知识，只是阶级觉悟……现在我们工人只知道帝国主义者是顶大的敌人，要竭力去打倒他的。”^⑯《山东劳动周刊》第1期的“特刊记事”报道了山东淄博、博山等地煤矿工人成立工会的盛况。《劳动周刊》第18期报道了京绥铁路工人、汉口人力车夫、湘鄂印刷公司工人和广东纸

业工人的罢工情况。在报道湘鄂印刷公司工人罢工情况时,文章指出,工人这次罢工胜利与否,“看他们的团结力如何吧!”^⑩武汉《劳动周报》第3期的“时事要闻”栏报道了德、意、墨西哥等地工人斗争的情况,反映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苏俄工人教育事业的关怀等。湖南《劳工周刊》创刊号的“世界要闻”栏目报道了日、德、法等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报道日本横滨船港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时有意向工人们提出问题:“请问他们这次胜利怎样来的呢?大家想想就知道了。”^⑪这些关于全国各地工人罢工以及工会成立消息的报道,无疑对工人起到了鼓舞和教育作用,促进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尤其是对世界各国工人罢工斗争的经过和取得成绩的详细报道,开阔了中国工人的视野,有利于他们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另外值得肯定的是,早期工人报刊大多开设了书报广告栏目,但它不是商业广告,而是借用广告的形式启发工人的觉悟。列宁说:“我们需要创办报纸不仅是为了要它帮助我们工人进行斗争,而且是为了……成为他们的火炬。”^⑫《中国工人》第2期封底的广告页就写道:“点起一把火来,把我们工人现在所处的黑暗地狱,照得通红了。使我们工人都明白了自己所站的地位。和脱离地狱的路途!这把火就是——《上海工人》。”^⑬《工人周刊》第63期第二、三版报缝在介绍《京汉工人流血记》时写道:“本年二月一日京汉工人为了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实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一件最重大的事。现在工人周刊社已将这回罢工的前后详细情形编成一本《京汉工人流血记》。全书约九万余言……凡属劳动者及社会运动的人,均应人手一编。”^⑭

此类工人报刊得到了广泛传播。1922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劳动周报》发行最多时达5000份,前后共印行16.5万张。1923年11月,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党与胶济路的一个1000多人的工会建立了联系,“工刊每期寄去二百份”^⑮。青年团上海地委组织部在报告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有关印刷物传播方面的工作时指出,《总工会三日刊》《工人画报》每期各发行了200份^⑯。《工人生活》开始发行时就达1000余份,后增至2000多份。《工人周刊》在陇海铁

路全线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郑州设立了发行站,还安排了发行员,在工人中的影响非常大。有人指出,铁路工人一般都没有文化,中央出版的工人刊物“成为工人必读的精神食粮,工友们也珍视这些刊物,手中拿着这些刊物感到很自豪”^⑰。正是通过阅读报刊,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得到提升,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不仅敢于反抗,而且能通过自己掌握的新话语、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分析原因。如武昌官纱局工人陈义华休息时因阅读《劳工周刊》遭到管工斥退,工人们气愤不平,认为因家贫失学已非常痛苦,工余时间看看报纸,反被厂方干涉,“是不以人类待我们了”^⑱。为了获得应有的人格尊严,他们散发传单,号召大家一起去质问局长。再如,湖南造币厂工人们订阅的《劳工周刊》遭到厂方没收后,他们质问厂方为什么想看报学一点儿知识都不行,办事人员却说工人不配读书,觉悟的工人们愤怒地驳斥道:“我们工人是‘人’,为什么不配读书求知识呵!”^⑲

中共早期指导创办的工人报刊文字浅显,符合工人的心理认知和文化水平。报刊上的文章用鲜活的事例和精确的数据反映了工人在生产、生活上遭受的压迫,使工人读者感同身受,共同的阶级经历和阶级利益使他们认识到阶级团结的重要性;这些报刊结合工人罢工斗争的实践,通过平实的说理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扩大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接受程度,并使他们认识到,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

三、消除行帮隔阂,制定斗争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组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无产者组织起来并产生普遍联系,是阶级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列宁曾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⑳中共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产业工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㉑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党组织“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㉒。据毛泽东回忆:“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

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⑤在中共的努力下,广大工人已认识到团结统一的重要性,许多工会团体“都觉得有全国联络之必要”^⑥。1922年5月1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和组织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来在中共领导下又召开了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见表3)。

中共早期领导和组织的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从召开过程来看,都起到了联系和团结全国无产阶级的作用。组织者在报纸上发布召开信息,表明开会主旨,表达工人诉求,从而使身处各地的工人群众关注大会召开的情况,了解全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如1922年4月12日的《新闻报》报道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及办法,要求各团体派代表一人赴会,共同讨论会议提案等^⑦。4月12日,《申报》也刊载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说明开会宗旨是纪念五一节、联络全国工界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等^⑧。报道得到全国工人群众的广泛响应,“不论接到或未接到通告的工会,都大为欢欣,竞派代表与会”^⑨。《时报》在4月18日、23日、29日连续报道各团体所派代表,如中国劳工同盟会推举谭竹轩参会,汉口人力车夫工会代表彭大汉、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棠等先后赴粤^⑩。上海《民国日报》称赞全国劳动者联合起来了,“开了一个破天荒的劳动大会”^⑪。《四民报》在对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提案进行连续报道后,认为这些提案反映了中国工人的觉悟程度,肯定大会为“空前未有的全国劳动大会”^⑫。1925年4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消息,通知了经费的筹集、会场及办事地点、大会组织等情况^⑬,随后对这次大会每天的进程进行了详细报道。《人民周刊》则对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宣传大纲进行了详细报道,如“为什么要召集全国劳动大会?”“第三次劳动大会的特殊意义”“在

此次大会上得到些什么?”^⑭这些媒体信息使得关注这些大会召开的工人群众不仅能获得直接的理论指导,而且能切身感受到大会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中共领导和发起的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还在组织上消除了行会、帮口、黄色工会等对工人阶级团结造成的不利影响,在阶级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人组织的统一。由于受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工人大多借助行会、帮口、码头等封建色彩较为浓厚的组织进行抗争,但因主张不一、宗旨不同,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共同遵守的原则,工人抗争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中共成立后,为推动各工会团体的联合和团结、谋求全国工人组织的统一而不断探索。

在中共的协调和努力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政治口号,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十个决议案。其中,《罢工援助案》规定,凡有工会领导的罢工发生,均由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知全国各地工会,各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发生时,即通知会员,采取统一行动。《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指出,“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斗争力就异常雄厚”,按照产业组合原则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⑮。大会通过的《第一次劳动大会宣言》描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生活,分析了工会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认识到阶级的对抗,指出:“无论哪种或哪个地方的工人们对本资本家的奋斗,都是我们这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奋斗;我们必定要互相援助,才能得到胜利。”^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历史上具有开先河性质的会议,促进了工人的团结和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人指出:“第一次的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无产阶级团结的开始……是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纪元,是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⑰,“不可谓非

表3 第一至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情况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到会代表人数	代表工会和会员数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2年5月1日至6日	广州	173人	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34余万会员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5年5月1日至7日	广州	281人	代表166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54万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6年5月1日至12日	广州	502人	代表全国699个工人团体、124万多会员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7年6月19日至29日	汉口	400余人	代表有组织的劳动者290万余人

吾国劳动阶级一大觉悟”^⑧。大会结束后,中共二大召开,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指出工会与行会不一样,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⑨。各地工运骨干秉承两个大会的精神指导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明显提高。1922年10月,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11月,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随后,京汉、京绥、京奉等17条铁路的64个工会的代表筹备建立全国铁路总工会。12月,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成立。针对广州的一些行会转变为工会,《社会学杂志》评论道:“是以多数工人,均乘政体改变略放光明之际,即起而从事组织工会,将从前笨钝腐陈之行头会馆公所及东西合行等,极力推翻,进而为有章程有方法之工会。”^⑩邓中夏称赞第一次劳动大会“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⑪,为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1924年5月,中共召开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进一步指出,工人加入工会或在工会中的地位不应受党籍、国籍和帮口的影响,党和工会应在工人中打破地域和帮口观念,“工会的责任是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扩大他们的眼界”^⑫。这一时期的工人报刊遵照党的指示,批评工人的帮口和行会意识,强调阶级团结,主张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总工会进行总同盟罢工,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彻底的解放。如武汉《劳动周报》第3期发表的《省帮与阶级》一文,指出工厂里的不同省帮如广东帮、两湖帮、三江帮、福建帮、天津帮及本地帮等存在相互排挤、互不相容的现象,并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资本家及其帮凶害怕工人团结,利用他们的弱点,让工人互相残杀,无力反抗,让资本家“好施剥夺的手段,及拥护他们的地位”。文章还通过阶级对比,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资本家及其帮凶已经认清“他们的同类都是一阶级的(有产阶级的人)”,“我们都是穷苦的人,换句话说,都是一阶级的人,无产阶级的人”,而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处在对垒的形势”。因此,无产阶级要打破错误的省帮观念,团结起来,“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向资本家奋斗夺取生产机关”,“争回我们

应有的权利呵!”^⑬对阶级敌人的认知是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表现,共同的阶级利益弥合了传统阶级身份之间的裂隙,促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此,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专门通过了《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明确说明“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宽泛的群众组织”,指出中国传统行会造成了工人势力的分裂,使他们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抗衡,只有组织产业工会,才能代表一切工人的利益,进行阶级斗争。大会还特别强调工会的阶级性,认为工会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⑭。这也体现了中共三大的主张,即要求“工会的组织应与党的组织并重,对于近代产业工人,更应发展其阶级的意识”^⑮。正是有了对工会阶级性的正确认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才通过了《香港问题决议案》《广东问题决议案》和《上海问题决议案》,前两个决议案指出香港、广东的各工团“违背近代工团统一运动之意义”,要求这两地的工人组织派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决定化除门户之见……务使所有工会统一”。《上海问题决议案》则要求联络真正的工会成立上海工会总机关,“以便真能为无产阶级谋利益,而抵抗帝国主义、资本家以及工贼之联合进攻”^⑯。随着工人阶级意识的确立以及阶级觉悟的提高,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是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职责是发展全国工会组织,统一全国工会运动;发布全国工人共同奋斗的目标;提高工人知识,联络相互感情;等等。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实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工人阶级的团结。时人认为:“这是对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一个大示威,是对于资本主义下总攻击的开始。”^⑰未久,五卅运动爆发,再次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达50万,全国直接参加的民众约1200万,不仅表明工人阶级已完全觉醒,而且在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报告《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时评价说:“此种运动与牺牲,以工人为最

多,而又以工人为最力,处处都有罢工……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实际地处在领导地位。”^⑧舆论界也肯定五卅运动“开我国劳工史上之新纪元”^⑨,无疑是中国工人走向阶级自觉的最好例证。

工人阶级的成长还体现在对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正确认识上,这也是工人的阶级意识逐渐成熟的表现。早期工人的斗争主要是针对单个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经济斗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为了广泛联系各工会团体,促成工人的初步团结,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表示大会的宗旨之一是讨论改良工人生活问题^⑩。中共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将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因此,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案指出,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同时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人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⑪。经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后,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认识到为了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专门通过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的利益绝对不能调和,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工人为改良生活需要不断斗争,“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同时,大会并没有反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大会通过的《经济斗争的决议案》表示,在目前工人群众的劳动条件下,不否认经济斗争,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良,都可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但要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让工人认识到他们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⑫。可见,这次大会较好地处理了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久后爆发的五卅运动即表明了工人阶级对大会精神的贯彻,最初上海纱厂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但顾正红遭到杀害,从而将经济斗争扩大为政治斗争,最终发展为全国性的反帝运动。经过五卅运动的残酷斗争,面对工人人们的苦况,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对

于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原则有了进一步认识,大会通过的《经济斗争最近目标与其步骤决议案》确认经济斗争是工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指出须具有政治性,即经济斗争的目标包含有不脱离政治斗争的作用。《罢工战术决议案》则明确要求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并引用列宁所言“每一个经济的罢工,同时是政治的”,来肯定工人阶级经济要求的扩大有助于增长政治斗争的勇气,也指出需要注意在每一次经济罢工时引导工人走向政治斗争之路,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最终获得政治上的解放。

四、结语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最初在工人中传播并产生影响。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工人阶级教育落后,一般工人连“工人”概念都不知道,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何物,更谈不上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与西方工人阶级不一样,中国工人阶级需要进步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自觉,逐渐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组织。

中共的成立使对工人的培养和改造有了政治领导的核心。早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共因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也需要深入工人中去,与广大工人建立联系,巩固和扩大阶级基础,从而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一致。因此,中共成立后,一方面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推动下,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发行工人报刊,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有目的地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使他们理解到自己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认识到阶级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共组织召开多次全国劳动大会,将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通过决议案的形式确定下来,再由参加会议的各地工人代表进行宣传、传达和贯彻。在罢工斗争中组建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经济和政治斗争,尤其经过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的洗礼,工人阶级认识到,只有与压迫自己的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工厂主等展开阶级斗争,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可以说,中共早期是以列宁

所主张的灌输理论为指导来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的。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③。

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中共的自觉担当紧密相连,这说明中共成立后就找准了政党的发展方向。如中共关于工人运动的议决案指出,纺织、矿业、铁路和海运等工人都是党的基础,只有团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中共认识到,产业工人能接触先进技术,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样遭受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因此须努力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提高其阶级觉悟,认为“这种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在各种斗争中,中共特别注意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强调各种产业工人的组织在党的指导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④

当然,中共早期面对的工人阶级处在复杂时局中,国家政权分裂,军阀割据各方,各派军阀又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纠葛在一起。这样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需要一个成熟的政党进行指导,而中共早期一直处在探索时期,其经验还不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比如中共的一些决议案在总结各地工人运动的经验时,就多次指出在组织、宣传和教育上存在的缺点。但不可否认,中共自觉承担无产阶级先锋队队的历史使命,培养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建立统一的工人组织,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主体阶级力量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必然逻辑。

注释:

① 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8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③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23页。

④ 邹慧珊:《劳工的价值》,《甬江声》第2期(1925年7月)。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8页。

⑦ 李忠杰、段东升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60页。

⑨ 《天津工人图书馆募书启事》,《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9日。

⑩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367-1368页。

⑪ 《郑州工会志》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⑫ 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2页。

⑬ 史兵等编:《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60页。

⑭ 《中共岳阳市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⑮ 《楚晖丛书》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3页。

⑯ 《一天做工八点钟歌》,《平民之友》第10期(1924年8月)。

⑰ 刘功成:《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邓中夏》,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第102-103页。

⑱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9、460-461页。

⑲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242页。

⑳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70页。

㉑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936、1369页。

㉒ 《唐山工人图书馆启事》,《工人周刊》1921年12月18日。

㉓ 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编年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㉔ 浙江省总工会编,单建明执笔:《浙江工人运动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页。

㉕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㉖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页;《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8页。

㉗ 《长辛店工会成立》,《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

㉘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武汉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㉙ 石夫:《资本家何等残暴!》,《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㉚ 余福媛:《〈青年工人〉月刊》,《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

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3页。

①硕夫:《工人的知识问题》,《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②全国铁路总工会编:《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印行,第4-5页。

③陆米强:《现代革命史料研究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④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656页。

⑤陆米强:《现代革命史料研究文集》,第418页。

⑥《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册,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6页。

⑦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⑧《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141页。

⑨余照溥:《“五一”劳动节告工友们》,《工人之路》(特号)1926年5月1日。

⑩世外渔夫:《“五一”劳动歌》,《工人之路》(特号)1926年5月1日。

⑪《工人的知识》,《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7月15日。

⑫《湘鄂印刷公司制造罢工潮》,《劳动周刊》第18期(1921年12月)。

⑬《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第126页。

⑭《列宁全集》第21卷,第413页。

⑮《广告页》,《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⑯《〈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了!》,《工人周刊》1923年5月1日。

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0、187页。

⑱《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册,第465-466页。

⑲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4册,第84页。

⑳《工人连报都看不得了》,《劳动周刊》第18期(1921年12月)。

㉑《为什么厌恶工友们看报》,《劳工周刊》1921年11月5日。

㉒《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页。

㉓《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页。

㉔《“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页。

㉕[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1979年印行,第310页。

㉗《全国劳动大会之开会期》,《新闻报》1922年4月12日。

㉘《全国劳动大会之发起》,《申报》1922年4月12日。

㉙《空前的全国劳动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24日。

㉚《全国劳动大会近志》《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纷纷赴粤》《工团对全国劳动大会提案》,《时报》1922年4月18日、4月23日、4月29日。

㉛《空前的全国劳动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24日。

㉜《空前未有的全国劳动大会》,《四民报》1922年5月24日。

㉝《全国劳动大会消息》,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28日。

㉞《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宣传大纲》,《人民周刊》第9期(1926年5月)。

㉟《邓重远:《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25日。

㊱《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8日。

㊲《识因:《五一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京报副刊》1925年5月1日。

㊳《空前的全国劳动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24日。

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9页。

㊵《一年来广州工界罢工之统计》,《社会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22年4月)。

㊶《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海书店,1990年,第63页。

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6页。

㊸《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第118-119页。

㊹《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8、20页。

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1页。

㊻《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6、27页。

㊼《识因:《五一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京报副刊》1925年5月1日。

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53页。

㊾《许敦楷:《1925年我国劳工问题之回顾》,《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0号(1926年10月)。

㊿《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6页。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7页。

②《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2、14-1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8-289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4-235、346页。